

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社会风险意识考察

——以对皖南 S 村农民的访谈为例

王道勇¹, 江立华²

(1.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2. 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通过对皖南 S 村留守农民与农民工的访谈, 可以发现, 农民的社会风险意识正处于过渡时期, 新型社会风险已经影响农民生活的各种层面, 新型风险意识急需确立, 相应的风险应对机制亟待完善。

关键词: 现代性; 风险社会; 风险意识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扩展、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日益增强, 传统的中国农民尤其是流动的农民工正与风险社会迎面相遇, 风险因子、不确定性正在渗入农村的宏大场景与农民的微观互动之中, 影响了居村农民与作为流动人群的农民工的生产与生活。本文拟通过一次具体的入户访谈, 以访谈资料为基础, 利用吉登斯、贝克和斯科特·拉什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部分概念、命题, 来审视居村农民与外出农民工现有的风险意识。

—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 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系列巨大而深远的变迁, 社会学家们为理解、解释这种世界性危机与机遇共存的新型社会提出了各自的理论框架, 如“后现代性”、“晚期现代性”、“全球时代”、“自然政治”、“世界民主”等分析范式。德国社会学家贝克也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命题。1991 年, 卢曼在《风险社会学》一书中, 从科学和社会系统分化的关联性角度解析了风险社会的意涵, 此后逐渐形成了分析社会问题的风险社会视角。

贝克的危险社会理论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的全面推进, 那种认为人的理性力量可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常态”社会观, 已经被世界所面临的深层社会矛盾和严重的生态危机替代。[1] (p.1-10) 贝克指出, “风险”是一种危险 (Danger) 和灾难 (Disaster) 的可能性; 现代风险是隐形的, 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它的影响将波及全社会, 而且是以一种“平均化分布”的方式影响到全球所有穷人与富人; 理解并以崭新的制度来规范风险社会中的“定义关系”, 消除“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是风险社会议题的重要内容。而斯科特·拉什则从风险文化角度对风险社会的涵义进行了解读, 他与道格拉斯等人认为贝克仅强调了自然生态风险, 而实际上还存在着社会结构方面的社会政治风险如人类暴力犯罪、战争、恐怖主义等, 存在着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经济风险。吉登斯则从“反思性的现代性”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中的风险议题, 他从专家统计的吊诡性这一角度切入, 对现代性与风险的关系进行考察。他认为现代性的变迁产生的风险影响了个人与社会的互动, 现代性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人为风险为主、传统风险为辅的新型风险景象, 专家系统自身所固有的专业知识不确定性使专家提供的决策建议已无法保证个人的安全, 风险影响的范围已扩及全球。[2] (pp.109-114)

具体到当前的中国,科技与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剧烈变迁中的城乡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传统的与新生的社会安全风险,其中较为突出的风险有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食品质量降低, SARS、艾滋病等高强度传染病暴发和流行、生态恶化及灾害应对机制落后、危机预警和监控机制欠缺,等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风险通过电子通讯、大众传媒使之仿佛就发生在身边,使风险呈现出一种放大效应;可以说,风险因子已经成为影响各种宏观与微观互动层面的重要力量。

为了具体了解作为传统的大本营的中国农村地区受风险景象的影响程度,以及农民自身的风险意识现状,我们选择一个中国中部地区不发达的农村进行个案访谈,初步了解现存的农民意识中的风险概貌。本次访谈的地点是安徽南部的一个地级市 C 市的乡村,我们在该市中部选择了一个行政村为调查对象,称该村为 S 村。之所以做如此选择,主要考虑到:其一,安徽省是农业大省,更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桥头堡,家庭联产承包制始于此,农村税费改革也发端于此,因此它是研究农民生活变迁的天然良好场所;其二,该市人口仅 160 万,工业基础较薄弱,以生存农业为主,而且外出打工人员集中,可以说具备以农业、农民立足生存的一般农村地区的众多共同特性,代表性相对较强。访谈在 2004 年七八月份和 2005 年二月份陆续进行,先后有 30 多位各年龄段的农民接受了访谈,其中在外打工的约占半数,其他的为长期居村的在家务农者、经商者。访谈内容涉及农民对日常生活中变迁的认识、外部风险对农业生产的冲击、自然环境的新变化,以及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因素的认识等方面。

二

通过对这些案例进行解剖,可以发现在 S 村,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风险意识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

第一,从风险的类型学角度看,一般认为,农村现存的风险以传统风险为主,风险的人为性与传统性交织并存,其中农民工对现代风险的认识更为深切。在风险类型的主观认定中,被访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目前的农村是旧有的风险未去,又添加了许多新型风险,这些风险更多的是人们自身的活动所带来的。居村农民认为,传统性的风险如春秋两季的干旱、七八月份的洪水等自然灾害依然影响着农民的农业收入。与此同时,新型风险也在增加,被访者列举出来的新型风险有使用化肥过度、外部工业发展造成的水质下降、环境污染严重、粮食市场化运作后的粮食滞销、以及交通风险与受暴力伤害的机率增加等。对于其中的新风险,外出务工人员的感受最深,也最为焦急。被访者陈某(32岁)说“现在世道变了,在外面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句话可能代表了农民工对外部现实风险的一种直觉性的反抗,以及一种无可应对的受挫感与焦虑感。出外打工的人员一般都是年青人,他们一方面认为居村的农民没见过世面,对新风险太过于大惊小怪,另一方面在城市中接受的众多信息也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那就是现在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在迅速变化:河里的鱼、山上的野兽等都在日渐稀少,而交通风险、失业风险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加。这让村民们尤其是农民工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新的生存风险压力。

第二,从风险的扩张性特征上看,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村民们基本上没有认识到风险已经使地域事件的影响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他们仍坚持对地方知识世界的维护。现代社会的风险往往在一定的地域内发生,但由于风险的突发性与因应对策的不完善性,风险有向全球范围扩张的本能冲动。而信息技术的发达使本来为地域性的事件也开始具有了全球性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既包括事件本身的影响力,更包括由于知识的不对称所产生的恐慌与危机感带来的更大更深远的负面效应。[3] (pp8-16) 在对风险事件冲击的回应上,接受访谈的村民们总体的表现是漠然视之,并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对地方性知识世界的自足运行加以维护。具体表现在访谈中,一方面,在经济生产与日常生活领域,他们一直在以地方性知识

来对抗世界性的共同知识。例如居村农民对入世对农业的影响几乎一无所知，仿佛这是天边的事。在这次访谈中，所有的受访者中只有两名农民工听说过世界贸易组织（WTO），而且这两人还认为自己与这个组织一辈子不相干；随着保护期限的到来，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农业生产经营将面临不可预测性因素日益增多的风险。但所有人都认为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国家农业保护与粮食流通的放开政策让他们看到的是日益好转的农业生产收益，而不是国家为保护农户在未来的全球农业竞争中的利益，而采取的无奈之举。由于粮食直补政策和农业税减免政策的落实，部分接受访谈的农民工甚至不再外出打工，而是选择了回村种田。另一方面，在风险意识转型方面，农民的意识转变远远落后于其物质文化生活的转变。例如，在现代性日益进入传统农村社区的同时，在农民的政治与经济生活领域中，环境危险构成了一个剧烈的冲突场域，环境破坏对村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最大的挑战，河流中水生物的减少、有机毒物含量大增、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等这些风险都是村民们能亲身体验的，但对村民而言，这些似乎与自己的生存安全毫无关联，即使有关联，也认为自己毫无办法，“这是大人物的事，与我们小百姓无关，只管好自己就行了，”（章某，居村农民，44岁）这句话也可以说是村民的共同心声。

其三，从风险的归因意识上看，一般表现为村民们对现代风险的传统诉求，以及主观归因，但农民工的现代归因取向更明显。村民们尤其是农民工都看到过，并且能够列举出现代风险，甚至有一部分被访者亲身经历过现代风险，但在风险意识归因方面上，他们依然是从传统的经验之箱中提取应对现代风险的心理与现实策略。部分村民已在感性的层面认识到这些新风险出现的人为性。访谈中，“这都是人在作孽”这句话可能是上了年纪的人对这些新风险的一个直观而又真实的认识。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新风险对他们具有哪些独特意义。一方面，村民们的应对传统风险如洪涝、旱灾的风险意识是长期累积的，应对手段几乎全是自发性的，几千年来已经积累起了大量的应对风险的朴素经验，当传统风险发生时，人们可以根据风险的大小而预见受影响程度的大小。“洪水年年发，就那样吧”（王某，农民工，24岁），这句话说明，在他们眼中传统风险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特别意识到其存在有独特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传统风险在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关键性角色：它本是村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使村民们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更人性化，更具有挑战性。另一方面，面对新出现的生态风险、经济风险，他们几乎无人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活动本身给他们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新型风险意识的缺乏将直接影响村民的行为抉择，使他们缺乏应对新型风险的有效手段与心理准备，而诉诸传统经验。例如当问及如何应对粮食滞销而带来的谷贱农伤时，认命、自发地改变种植结构或弃农经商打工成为村民的三个主要选择方向。再如，当问及如何评论本村外出打工致残与死亡，以及数量日益增多的本村人在交通事故、恶性疾病中丧生时，村民们一般认为这是个人“不走运”、“命不好”等，相对而言，对于新型风险农民工更愿意将之归因于外出这一行为取向的本身，而居村村民中很少有人意识到是人类本身的活动导致外部的新型风险的增加，从而出现这些负面的结果。

三

从严格的社会分析方法论角度看，个案资料不具有向整体推广的合法性，但从以上分析和资料中，我们可以就目前中国农民中的一部分居村农民与农民工的风险意识，得出以下一些暂时性的认识与启示。

第一，在现代风险社会里，部分农民的风险意识正经历着日常惯性与现代公共性的互动过程，其中居村农民与农民工对日常惯性与现代公共性的内化程度有所不同。现代风险已经影响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与经济收入，但对这种影响的实际程度村民们似乎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突出地表现于村民们一方面对全球化事件及其危机日益有所了解，另一方面却对风险的现实性进行虚拟化，不将这些全球事件与全球风险与自己身边的显在与潜伏风险相联系，

相反却以长期积累下来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应对新型风险的心理基础与现实手段。由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知识的复杂性日益增强,一般人尤其是一般缺少知识的居村农民与政府与专家系统之间有关风险的知识之间的落差在日益扩大,而农民工也与正式的组织体系之间也存在着信息沟通的障碍,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增强农民的风险意识、警醒其改变自身的风险应对策略,应成为农村工作中的重要内容。

第二,客观风险因子的增加与主观风险感应意识的滞后的矛盾,必将对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的生产与生活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现代风险基本上是由“技术——经济”(techno-economy)的人工决策所引发的,是工业社会的“副产品”,是由人为的科技发展行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人类中有话语权的一部分人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对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4]因此,作为社会低层的一般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中贫困与低收入人群与城市中的农民工基本上是没有话语权,或有话语权而自身没有运用这一权力能力的人群。因此在新的风险环境下,他们在日常生活与收入方面受到的影响就更为显著。他们应对与消解风险的能力也极其脆弱,一旦与诸如环境恶化带来的癌症等恶性疾病、粮食市场供求波动、职业供需变化等风险相遇,轻则收入大大下降,重则倾家荡产陷于贫困之境。

第三,在目前的农村,自发性风险应对机制与人为机制日益共存互动,风险应对系统需进行结构性的调整。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风险的日益可控性使其对农民尤其是农民工的生产生活的影响较为固定并日益缩小,而相比而言,由于专家系统知识本身与新型风险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风险不可预测性,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农民工和居村农民的日常生活与收入增长。从农村社会风险应对机制结构上看,目前部分农村地区的风险对应机制与处理系统极其脆弱,而且几乎全部为自发性的,还没有什么人为机制的介入,应对现代风险的机制完全缺位。与城市里日益健全的风险预防与治理机制如空气污染指数、传染病通报、物价上涨指数、失业率计算等相比,经验、惯性、风俗等传统应对风险的机制在农村中仍然占主要地位。这样,模糊性就成为农村日常生活中风险出现并被认识的主要特征。这要求通过各种手段使现代的风险预警机制与风险防范手段在农村日益普及。在这种背景下,调整风险应对系统的结构、增强农民对新型风险的防范与应对能力应成为努力的方向。这就需要增加农民应对现代的风险预防、治理与善后机制在风险应对系统中的权重。其中对居村农民较为重要的措施有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村基层设施如卫生医疗条件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能力等,对农民工较为重要的有加快各项市民待遇的落实,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步伐。惟其如此,农村中现存的主要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参考文献

- [1] 乌尔里希·贝克. 世界风险社会 [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2]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译林出版社, 1998
- [3] 贝克, 吉登斯, 斯科特·拉什. 自反性现代化 [M]. 商务印书馆, 2001
- [4] 斯科特·拉什. 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2 (4)

Research on the peasants and the Urban-rural Labors'sense of Social Risk

WANG Dao-yong¹, JIANG Li-hua²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entral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By interview on the peasants and Urban-rural Labors in S village of An-hui Province. We can find the sense of Social Risk of peasants i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New Social Risk has affected the peasants' life in all ways. New sense of Risk exact to establish , and the relevant mechanism of responding risk must to perfect.

Key words: Modernity; Risk Society; sense of Risk

收稿日期: 2005-05-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流动人群的公共教育及其权利保障研究” (编号 02ASH001)

作者简介: 王道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江立华,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